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6, 14(5), 1368-137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6.145192

Hans汉斯

讽刺小说对思维的培养

——以《范进中举》为例

周文娇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讽刺小说的批判意图不直接呈现在文字表面，而是借助小说中情节的反常、人物言行的矛盾以及双重表意结构，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认知冲突，进而推断判断与、分析与价值判断。本文借鉴保罗－埃尔德批判性思维三元结构模型，将思辨性思维操作化为识别问题、调动信息、分析假设、推理判断、形成结论五个认知环节。通过此框架去分析《范进中举》，小说的情节反常引发读者对因果关系的重新梳理，人物言行的前后矛盾激活评判空间的留白，双层含义的构造则要求读者跨越表层叙述进行深层推断。这三重机制分别对应思维元素中推理、假设与视角的激活，以及逻辑性、深度、广度等智识标准的运用。讽刺小说在思维培养上的独特价值，正源于其文本结构与思辨过程之间的这种关系。

关键词

讽刺小说，《范进中举》，思辨性思维，保罗－埃尔德模型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through Satirical Fiction

—A Case Study of “Fan Jin’s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njiao Zho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The critical intent of satirical fiction is not presented directly on the surface of the text. Instead, it relies on the abnormality of plot, the contradictions in characters’ words and deeds, and a dual

文章引用: 周文娇. 讽刺小说对思维的培养[J]. 国学, 2026, 14(5): 1368-1373.
DOI: 10.12677/cnc.2026.145192

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 to generate cognitive conflicts in readers, thereby prompting them to make inferences, analyses, and value judgments. Drawing on the Paul-Elder tripartite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operationalizes critical thinking into five cognitive stages: identifying problems, mobilizing information, analyzing assumptions, making inferences and judgments, and forming conclusions. Using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Fan Jin's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finds that the abnormality of the plot prompts readers to re-examine causal relationships; the contradictions in characters' words and deeds activate the blank space for eval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 meanings requires readers to go beyond the surface narrative to make deep inferences. These three mechanisms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activation of reasoning, assumptions, and perspectives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ought, and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standards such as logicalness, depth, and breadth. The unique value of satirical fiction in cultivating thinking lies precisely in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textual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

Keywords

Satirical Fiction, "Fan Jin's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ritical Thinking, Paul-Elder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学与思维发展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教育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共同关注。围绕讽刺小说这一特殊文类，已有研究大致可从三条脉络加以梳理。

(一) 研究现状

第一，讽刺文学理论的研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详细论述讽刺小说的创作宗旨与艺术风格，指出其立意应“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艺术上则须“感而能谐，婉而多讽”[1]。此后，围绕《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学界从小说题旨、作品结构、人物刻划等维度进行了大量探讨[2]。在西方讽刺理论方面，弗莱对反讽与讽刺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判断：反讽的运用需要读者的辨识力，“如果没有读者的体认和辨识，反讽话语是无效的”，因此反讽“是一种自我批判、自我认知、自我反省模式”[3]。

第二，批判性思维与阅读教学的研究。保罗和埃尔德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高层次思维模式，“它以提高思维为目的，对思维进行分析、评价和重构”，并据此构建了包含思维元素、智识标准和智力特质的三元结构模型[4]。邵路燕立足《范进中举》，围绕“讽刺艺术”的议题，甄选联读文本，通过“三阶”推进课堂教学[5]。文秋芳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思辨能力的层级理论模型，将思辨能力分为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两个层次，后者涵盖认知与情感两部分[6]。在阅读教学领域，欧阳林等学者系统探讨了批判性思维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结合路径，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角度分析了批判性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7]。然而，这些研究多以论述文或一般性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对讽刺小说这一特殊文类的思维培养机制关注较少。

第三，《范进中举》的教学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对小说讽刺艺术的分析，包括对比、夸张、细节描写等手法的运用；二是对小说教学策略的探讨，如“言语体验－对比思维－价值思辨”教学模式的构建、“由喜入悲”的思辨性教学设计等。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构建以《范进中举》为典型案例的高阶思维培养模型，但多停留在策略罗列层面，缺乏对读者认知过程的深层分析。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

思辨性思维的操作性定义。本文采用保罗–埃尔德(Paul & Elder)的批判性思维三元结构模型作为分析框架。该模型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思维元素(elements of thought)、智识标准(intellectual standards)和智力特质(intellectual traits)。思维元素指任何思维活动都包含的八个基本成分：目的、问题、信息、概念、假设、推理、视角和启示。智识标准指用以检验思维质量的九项准则：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相关性、深度、广度、逻辑性、重要性和公平性。智力特质则指理想思维者应具备的品质，包括智识谦逊、智识独立、智识勇敢、智识正直、智识坚毅等[4]。保罗和埃尔德强调，批判性思维者总是“用特定的标准检验思维的主要内容或元素，从而提高自己的思维质量”，这一过程是“循环往复且螺旋上升的”。

本文将“思辨性思维”操作化为以下可观测的认知活动序列：(1) 识别问题：读者意识到文本中存在需要解释的疑点；(2) 调动信息：读者再读文本细节，提取与疑点相关的信息；(3) 分析假设：读者检视自身原有预期和文本隐含前提之间的差异；(4) 推理判断：读者基于文本信息进行因果推断和逻辑分析；(5) 形成结论：读者在多重可能性中作出有依据的价值判断。这五个环节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

认知冲突的学理阐释。认知冲突的概念根植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认为，当个体遭遇与已有认知结构不一致的信息时，会产生失衡状态，而这种失衡恰恰是认知发展的驱动力——个体通过同化或顺应来恢复平衡，从而实现认知结构的更新。在阅读心理学领域，Frager 和 Thompson 的研究表明，当读者遭遇观念冲突时，由心理不适感所驱动去消解这种不协调，这一努力很可能激活那些被称为批判性阅读和思维的认知过程。换言之，认知冲突并非阅读的障碍，而是思辨活动的触发器：它打破了读者原有的认知平衡，产生一种失衡的急迫感，进而激发求知欲望和探究动力。

《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典型篇目，有着丰富的教学价值和思维含量。小说围绕主人公范进中举前后命运骤变这一核心事件展开，描绘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长期以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批判封建社会这一主题之上，而对其在思维能力培养层面所蕴含的潜在价值方面，缺乏一定的关注。《范进中举》所呈现的反讽叙事、人物塑造的多重性以及情节安排的悖谬逻辑，为探究讽刺类作品与思维培养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适合的文本依据。本文将从讽刺小说的文本特征出发，以《范进中举》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叙事技巧如何引发读者的认知活动，探讨讽刺文学在思维培育方面的独特价值。

2. 反讽叙事与认知冲突的生成

讽刺小说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叙述结构中表面意义与深层判断之间是相背离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不适感，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所引起。《范进中举》在情节设计上刻意制造了多处认知冲突，迫使读者在文本表层的“正常叙事”之外寻找合理解释，而这也正是思辨活动开始的标志。

(一) 情节逻辑的反常与读者预期的落差

《范进中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无疑是范进闻知中举后喜极而疯的一幕。从叙事表面看，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秀才因突来的功名而精神失常。然而，这一场景的荒谬性恰恰与读者既有的常识，二者之间造成了认知冲突。按照常规的生活逻辑，科举中第是读书人多年苦读的目标，科举获得成功理应是兴奋与欣慰的，而不是精神崩溃。范进中举后的精神失常显然违背了读者的心理预期，情节的发展方向与读者的心理期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错位。

这种错位并非作者写作上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读者若要理解这一情节的合理性，就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偶然事件”，而是应该把目光转向到范进生存处境之上。范进在中举之前，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科举失败，他的社会地位低微到连岳父胡屠户都可以随意辱骂的程度。科举功名对他而言，

不仅意味着仕途身份的改变，更直接关系着基本人格尊严的获得。当这一期盼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时，长期压抑的精神状态瞬间崩溃，在叙事的逻辑内部反而是“合理”的，说得通的。读者被情节的反常所触动，就不得不回过头去梳理故事的前因后果，这一过程也就是保罗–埃尔德模型所描述的批判性思维过程：识别问题、调动信息、重新推理、形成新的理解。

(二) 人物言行的前后矛盾与评判空间的留白

除了情节设置的反常之处，《范进中举》中人物言行前后不一的现象，同样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感。胡屠夫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范进中举前，他形容女婿“尖嘴猴腮”，说对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语气里满是对范进的鄙夷与不屑。等到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改口称范进为“贤婿老爷”，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9]。同一个人，前后评价天差地别，读者在读到此处时很难不感到困惑。

从保罗–埃尔德模型的角度看，这一矛盾主要激活的是思维元素中的假设环节。读者在阅读前文时，已经基于胡屠户的言行建立了关于这一人物态度的假设。当后文出现与此假设完全矛盾的信息时，原有的假设受到挑战，读者被迫去追问：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态度的剧烈转变？作者在叙述中没有直接对胡屠户的言行转变做出任何评价，既没有点明这是虚伪，也没有说这是势利，只是如实呈现这些矛盾之处。作者不急于下结论，而是把批判的空间留给读者。读者需要自行发现胡屠户前后言语中的不一致，并推测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原因。范进还是范进，才学品貌并未因为中举而有所改变，真正变的是范进所获得的功名身份所附带的社会权力。文章通过范进中举前与中举后胡屠户的言行对比，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胡屠户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嘴脸，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深刻的批判[10]。当读者能够通过文字品析出作品深层含义的同时，他的思维也在发展。

这种特别的塑造人物的方式，不同于一般作品直接或间接对人物作出评价，会让读者放下对人物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先去理解胡屠夫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再来评判他的好坏。给予了读者无限思考空间的同时，理性思维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展。

3. 双层含义与推理能力的培养

讽刺小说在叙事表达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往往有两层含义。从表面看，它讲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但在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潜在的观点与评价。打通这二者之间的障碍，需要读者根据文本进行大量的推断与补充，这也为锻炼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一) 表面故事与深层批判之间的落差

《范进中举》的表面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屡次落第的贫穷读书人，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中举前的冷嘲热讽到中举后被人阿谀奉承的巨大转变。通过阅读文本，读者能够对故事情节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小说的深层意思远不止于此。作者吴敬梓真正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描绘一个人命运转折的奇闻，去呈现封建科举制度下文人处境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表层与深层之间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读者开展推断活动，例如范进中举后众人态度变化的对比，张乡绅前来攀亲送房，邻居主动帮忙办事，胡屠户一改之前冷嘲热讽的态度。这些情节都是为文章服务的，具有连贯性，但真正的讽刺意味需要读者主动进行思考与追问。“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中举前后会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变化，到底是由于范进本人产生变化，还是因为功名而带来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当读者对这些内容产生疑问时，意味着他他已经在运用保罗–埃尔德模型中的问题这一思维元素，从文本表层的信息中识别出需要解释的疑点。科举功名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的内在价值被严重忽视。

(二) 局部讽刺与整体判断的关联

《范进中举》中的讽刺不仅仅体现在某些细节之处，这些细节之处的讽刺又能构成一个整体，形成

一个完整的讽刺。从范进的疯癫到胡屠户的前倨后恭，从众邻居的热心帮忙到张乡绅的攀附拉拢，每一个局部场景都有独立的讽刺效果，但这些局部场景又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来达到批判的目的。读者需要在把握局部细节的基础上，将这些分散的讽刺细节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判断。

从局部细节到整体判断的认知过程，对思维的训练具有重要意义，从保罗－埃尔德模型的角度分析，这一从局部到整体的认知过程，涉及视角这一思维元素的运用和广度智识标准的检验。如果读者只注意到某一个讽刺细节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就难以把握小说的完整意思。反之则对于文章主旨的理解便较为空泛。《范进中举》这篇文章要求读者必须将细节与整体统一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读懂文章。从胡屠户的言语变化中看到人性的势利，从张乡绅的攀附中看到官场的生态，从范进的疯癫中看到制度的压迫，这些细节整合成完整的讽刺创作。这与逻辑思维“先分析，后综合”的运作方式是极为相似的，在整合的过程中，也发展了思维。

4. 指向现实与反思判断的展开

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批判，讽刺文学虽然写的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现象，但它批判的不只是当时存在的某一现象，更是透过这一现象展现人性弱点与价值困境。《范进中举》所呈现的，并非仅仅是明清科举制度的弊端，从深层看，它让我们看到：在功名面前，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11]这种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意义，将读者的视野从思考文本延伸到现实世界。在保罗－埃尔德模型中，这一过程对应着从智力特质层面的发展到公平性标准的自觉运用。

(一) 从读懂文本到提炼普遍问题

《范进中举》表面上的讽刺对象是科举制度以及社会不良风气，但进一步看，作者批判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尊严与价值被放在外在标准之下衡量，个体失去了精神的自主。范进把一生精力投入在科举之中，他对自身的评价依赖外部的认可；胡屠夫对女婿的态度由功名身份的变化而决定；张乡绅的主动结交更是赤裸裸的权力趋附。这些人物都深受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影响，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

《范进中举》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展开，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却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性。在任何时代，人都可能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功利标准去衡量一切。读者在理解文章的讽刺指向后，自然会将文本中的问题联系到自己身边的现实进行对照与反思。这一从特殊到普遍的认识过程，对应着保罗－埃尔德模型所描述的智识谦逊和智识独立两种智力特质的发展：智识谦逊使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判断也可能受到社会观念的潜在影响；智识独立则使读者有能力超越流行的价值标准，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

(二) 重新判断与独立看法的形成

讽刺小说的最终目的，不是让读者停留在认识批判对象这一层，而是引导读者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范进中举》的阅读不能仅停留在接受作者现成结论的层面，思辨性思维要求读者在理解作者立场的基础上，能够对文本所呈现的问题有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以范进这一人物形象为例，范进究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还是一个应当被批判的庸人？从制度批判的角度看，范进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从个人角度看，范进对功名的执迷，中举后的做派又显示出他的庸俗。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把思考判断的空间留给读者。读者需要在文本依据与个人立场之间进行协调，在理解作者意图与形成独立判断之间保持平衡。保罗－埃尔德模型中的公平性标准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读者需要在文本依据与个人立场之间进行协调，在理解作者意图与形成独立判断之间保持平衡。这一过程所锻炼的，正是独立思考与理性论证的能力。

5. 总结

《范进中举》在思维培养上的价值，来自小说本身的写法。情节的反常、人物言行的矛盾以及双层

含义的构造，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产生疑问，进而去推断、分析和判断等思维活动。以保罗－埃尔德批判性思维三元结构模型观照这一过程，可以看到：讽刺文本的叙事策略与思辨性思维的运作机制之间关系密切，反讽叙事所制造的认知冲突，恰好激活了思维元素中的推理、假设和视角等环节；双层含义所要求的推断活动，恰好对应了智识标准中的逻辑性、深度和广度等准则的运用；而讽刺小说对读者独立判断的期待，则指向了智识独立、智识谦逊等智力特质的培养。

讽刺小说的价值不仅是批判现实，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需要反思的阅读体验。读者要根据表面的叙述，不断推断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于语文教学而言，这意味着应当充分认识和利用讽刺文本这一独特的思维训练资源，引导学生在阅读中经历真实的思辨过程。

参考文献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 孙丽华. 论《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1): 67-72.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M]. 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4] Paul, R. and Elder, L. (2002)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Prentice Hall.

[5] 邵路燕. “三阶”推进讽刺艺术的欣赏、迁移和创造——《范进中举》的教学实践与审视[J]. 黑龙江教育(教育与教学), 2026(1): 21-24.

[6] 文秋芳, 王建卿, 赵彩然, 等. 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 外语界, 2009(1): 37-43.

[7] 欧阳林. 批判性思维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8] Frager, A.M. and Thompson, L. (1984) Conflict: The Key to Critical Reading Instruc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Ohio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Columbus, 18-20 October 1984.

[9]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0] 吴凡. 以《儒林外史》为例探讨讽刺小说教学[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25(4): 71-73.

[11] 倪红.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与悲剧性——儒林群丑的典型塑造[J]. 语文教学通讯·D 刊(学术刊), 2025(12): 71-73.